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B104

张业松
著

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题解	1
----	---

一、鲁迅课

重读《呐喊·自序》	5
鲁迅文学的再认识	9
暗夜的苦痛和想象	16
复旦大学课堂上的鲁迅	25

二、从注释到文学史

“历史文本”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	37
应该再注一注《周作人全集》	42
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	46

三、“胡风问题”

胡风理论的错位与遭际	63
胡风问题的三个论域	75

四、舒芜研究

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97
舒芜的两篇“佚文”	129

五、人品和学问

贾植芳与《贾植芳文集》	155
“贾拒认舒”材料补	159
贾植芳先生的学术贡献	170

六、“学科”与“方法”

略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177
文学研究中的“上海”主题	187
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	194

七、文学期刊与当代创作

文学民主与个人才能	229
《上海文学》点评四则	243
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作者的文学身份本地化	252
向“新概念”要求“概念”	257

八、今三十年

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	263
《叔叔的故事》的文学史意义	276
如何评价《兄弟》	285
新世纪小说三记	289
代跋：贾植芳先生的最后时刻	294

题解

题名为《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是因为本书的内容与大学的文学课堂密切相关。首先是书中的一些篇章直接来自于课堂，是授课或讲演记录。比如《重读〈呐喊·自序〉》，原本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上的发言，承蒙钱进女士取得录音，寄来上海，由宗原整理成文；《鲁迅文学的再认识》、《暗夜的苦痛和想象》两篇，脱胎于在“上海普教系统名师培养语文学科基地组织”的演讲，刘云整理；《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来源于巴金去世后的一堂鲁迅课，那天的课恰逢鲁迅忌日，而巴金两天前去世，时间点非常巧合，我有些感慨，讲得多些，虞箐同学帮忙录了音，罗铮整理。由于我生性懒惰，事先很少准备完整的讲稿，事后更少把讲过的东西记下来，这些讲稿若不是朋友们帮忙，很可能也就随风而散，无可追迹了。所以尽管只是几篇平平无奇的文字，能够留存在这里，背后包含了很多课内课外的友谊和付出，是应该记取和感谢的。

其次，本书的相当一部分篇章，来自于课堂的触发和在此基础上的引申，是课堂教学与个人研究相互促进的见证。2004年秋季接手鲁迅精读课，《“历史文本”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是第一次上这门课时的收获，当时很想把标题写成《〈鲁迅全集〉的一条注》，想来想去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回去查书，才记起是章培恒先生用过的题目，未敢效颦。后来用了怎样的标题去投稿已经忘了，现在的标题及文内分段，都是《文汇报》“学林”版主编陆灏先生的手笔。《应该再注一注〈周作人全集〉》也是在《文汇报》“笔会”版上发表过的文字，周毅女士经手。贸然闯进一桩别人的笔墨官司里，发表的仍是我的讲课心得。记得周毅曾转给我看笔战一方的当事人对我的反馈，夸赞的主要还是她们的版面有勇气。

不独鲁迅课,本书的所有篇章,可以说都是我在复旦任教之后的产物。复旦课堂对教师和学人的磨砺,代有著例,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教导我:在复旦任教,第一位的是要把课上好,做一位好老师。我的师兄也曾不止一次地教训我:你看你,老想把自己跟老师比,老师是你能比的吗?呵呵,说的是。“好老师”的目标即使是我所敢望,恐怕也非三年五载能够炼成。在这方面,我充其量只是以自身经历为契机,对“以人养课,以课养人”的复旦传统多少有所体会和认识。这些认识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站稳复旦的讲台不容易。也许正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努力的老师,这种感受才尤其明显吧。总之我体会,复旦的课堂是一个成长的空间,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永远不要指望在这样的空间里停滞,或者说获得自己的“完成”,否则恐怕很难从中找到乐趣。在我,这些乐趣可以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的“正经”,也可以表现为《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的“捣乱”,不过我自己更看重的,还是《复旦大学课堂上的鲁迅》所记载的那些,觉得那才是复旦课堂的真正的迷人之处。顺带说明,《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一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做过修改,交《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是这个修订版。

最后,我受教于复旦二十余年,其中包括与已故的贾植芳先生密切接触的十余年。可以说,个人在文学乃至人生的主要方面的取得,无不与复旦、老师和先生的课堂息息相关。这样的课堂,它是有形的结构,也是无形的线索;体现于具体的人事,也呈现为抽象的坚持;是一时的经历,更是一生的因缘。总之,我受惠于这样的课堂,服务于这样的课堂,也别无选择地热爱着这样的课堂,最大的愿望,是不辱没这样的课堂。

2008年9月29日



五、人 品 和 学 问



四卷本《贾植芳文集》^①摆上案头，提醒我贾先生九十寿庆这个让自己在内心里激动了多半年的主题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第一次跟随业师拜访祖师爷，未识其门而在复旦九舍大门外先遇其人，局促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傻笑着跟在两位且走且谈的尊长身后亦步亦趋，到如今屈指算来，我竟已在先生身边生活了十多个年头，而先生的九十寿庆也已经安然过去了。九十岁的先生仍可让我这般没出息的“徒孙”有机会跟在他身后怀着一个出息希望傻笑，这该是何等欣幸的事。

在先生的寿庆会上，当年曾因“反右”遭罪，一度被与胡风先生关在一处的“广义上的难友”张强华先生开玩笑说，如果说与胡风同监是一种荣幸的话，你们这些后生们是不会再有这样的荣幸了。张先生的话说得轻巧，对我却是一个震撼，引发设身处地之想，思维开始跑马。一个人被突然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拉出去，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那一刻开始他所习惯的日常的一切就再也与他没关系了，那该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我想，任何一个人，当他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理上的压力都会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名义去定义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但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什么叫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人首先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其次生活在一个单位当中，再次生活在一个交际圈子当中。当他突然从正常生活中被拉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变了，和他无关了，家人的生死音信杳无，单位与他脱离关系，朋友和交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奢侈。在这样的情形下，人将何以自处？捱不过这一关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而终以殒颠痴死失智发狂乃至不知所终的人们该有多少！

贾植芳先生 1952 年从震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经院系调整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时候他精神焕发，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 and 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工作中去，开新课，做翻译，写小说，写论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新中国最大的典范是苏联，就像现在学习美国，美国的所有新理论、新作品都是我们最先要学习的东西一样，那时候在大学的中文系里，学习文学最先要学习的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就是俄国苏联的文学。为此贾先生率先开出俄国文学研究课，现在收在《贾植芳文集》翻译卷里的三部译作，《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论报告文学》，就是他当年为这门课准备的材料。其中《俄国文学研究》本不是一部现成的著作，而是他动用自己多方面的外语积累，从当时能够找到的外文报刊中自己编译出的俄国著名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贾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成绩，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是《契诃夫手记》，现在《贾植芳文集》把这些绝版多年的译作重印出来，所具有的不单是文献价值；这样的书和人，可以为今天的读者带来的应是多方面的启迪。

年轻的贾植芳这样地投入工作，首先说明了他的工作热情，其次说明他对自己工作的环境的认同程度之高，也说明着他在 50 年代初对于“新中国”即将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新面貌的一种体认。他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差不多半辈子的追求一朝实现，“新中国”成立了，他没有理由不把自己当成国家和社会的当然的主人，努力投入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他要从这个环境中被拿出去，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投入到新生活当中去时，突然被这个生活驱逐了，我想这种遭遇在一个人心理上所产生的震荡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今天我们披览收在《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的“文革”后期《写给任敏》的那些书信，应该不难体会，贾先生和师母在十几年互相不知生死的情形下，一个“活着就是胜利”的念头是如何命悬一线地承载了人生的全部重量。

回顾过去，贾先生经常说到一句话，那是他 80 年代初获得平反时的最强烈的感受，那感受他概括为：重新由鬼变成人。这样简单几个字的一句话中，实际包含了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这种经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把他由一个正常的公民、由一个“人”变成“鬼”开始的。然后，经过几十年，再重新由“鬼”变成“人”。记得贾先生真正的难友绿原先生对此有过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做“起死人而肉白骨”，可谓字字惊心。在这样的惊悸体验之下重新投

入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寿庆会上,苏兴良老师以同事的身份回顾了贾先生正式平反前应邀赴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整理的一个座谈会时的情形。在苏老师泪光荧荧的讲述中,贾先生重新投入正常生活时所体现出来的心底里的欢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欢欣啊。一个过去几十年都被这个社会彻底排除在外,对社会来说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无意义的存在,突然又被社会所需要了,他再次感受到生活对他的召唤,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能不欢欣吗?平反后的贾先生从他当时作为复旦中文系资料员的工作岗位起步,由现当代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开始他人生和学术生命的第二春,在担负多种学术和行政职务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单从数量上看远比他遭难前多得多的工作成绩(尤其是见于《文集》理论卷的部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啊。

有机会在贾先生的寿庆会上听到先生的难友和同事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先生,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如果你今天去跟贾先生交往,到他家去拜访聊天,他可能会对你说:我老了,再也做不动学问了,做学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听了可能会笑一笑。但是要知道,在这样一句朴素的表述当中,实际上不仅寄托了贾先生对后人的期望,同时也包含了他自己几十年的遗憾,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黄金年华白白浪费的人生遗憾,他希望这样的遗憾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

这样一些事情,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贾先生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贾植芳文集》小说卷里可以看到,贾先生早年的小说题目里经常出现“人”字,《人生赋》、《人的悲哀》、《人的证据》、《人的斗争》,可见“人”这个概念在他的人生体验中的分量。他反反复复提到“人”这个关键词,反反复复告诫我们要把“人”字写端正,这当中,实际上包含着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实践的对人、对人生意义、对人生价值的体认。

这样一种严肃地对待人、对待人生的意识,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传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着重强调的一条就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根据茅盾的说法,这个宣言是文研会十二位发起人公推周作人起草的,经鲁迅看过。茅盾当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他能抓住商务印书馆老板为捕捉白话文带来的新商机,放手将《小说月报》交给他去改版这

样一个机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竖起“文学为人生”的大旗,所凭借的正是直接求教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文化运动巨人,从他们汲取经验和精神。所以,今天贾先生以十分生活化的语言教给我们的为人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其实也正是从五四那一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

所以,在那个会上我说,面对贾先生,我们不是面对一个衰朽的、好像已经远离我们今天生活的老人,而是面对着一部活着的中国现代的历史和文学史。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儿在贾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去谈论他和他所亲历的这么一部文学史及文学现象,这是我们的幸运。现在放眼全国,像贾先生这样的人物,作为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可以来给我们讲课,可以让我们去请教他,这样的人物还有几个呢?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

承傅杰兄见告,得知《万象》2006年五月号有篇文章值得贾植芳先生一看,遂去找来这期杂志,拿给先生看了。先生看后,说了一声:“哦!”然后略为沉吟,又补了一句:“这个人无聊。”“这个人”指的是舒芜先生,所说的文章叫《贾拒认舒版本考》。

这还是上个月初的事情。当时因为一点什么琐事在忙,我直接把杂志拿给先生,待先生发表完读后感,就离开了,自己只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假期上海苦热,我成天躲在家里喘息,往先生家走动得少。前些天过去问安,才有机会认真拜读了舒芜先生的文章。一读之下,心生惊讶,当即翻检了贾先生的日记原稿,请先生讲述事情的原委,又顺便做了一点考订。现在把它写下来,以释舒芜先生之惑,兼补舒文材料之阙,或者不为无益也。

一

所谓“贾拒认舒”,借用舒芜先生自己的解说,是说他“曾登门奉访贾植芳先生,先生说‘我不认识你’,闭门不纳也”。此事见诸载记,时在“文革”后,大凡关心“胡风集团”及其相关人员之间的历史纠葛的,多少都会有些印象。但舒芜先生却不记得有这回事,说:“有没有这件事呢?我不记得有,也就是,我记得没有,可是说者说有。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都没有什么趣味。而说有者乃有四说,形成了四个版本,有趣在此。”所以才在“2005年元日开笔(该说开键),讨个吉利,不谈天灾,不谈人祸,谈个有趣小题目《贾拒认舒版本考》。”

舒芜先生是心思细密的学者,一生在人所不察的地方作出过许多高明文

章。其著者如考校周氏兄弟失和之后的间接交往^①，细者如从《追欢偶作》中发现白居易的“老流氓”、“老淫棍”面目^②，都足以启人神智、发人深思。但拜读这篇，我却不仅没觉得何等有益或“有趣”，反而只是替作者感到苦涩，深深以为世间大可不必有此文。作者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本该看淡许多事情、放开许多纠缠，心气和平地颐养天年，却还要与一些自承“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什么趣味”的琐碎苦苦周旋，这样的文字，何来“有趣”可言？就算“文章作法”上何等巧妙，又能找补回来多少东西？

总的来说我感到，舒芜先生这篇文章尽管看起来冷静客观，似乎在努力避免个人立场和感情的介入，只专注于材料的梳理和辨证，行文也是流水账风格，好像没什么刻意为之的成分，但这当然只是表象，文章的内里，决不是这么“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地云淡风轻、漫不经心的。相反，从它对“四个版本”的处理中不难看到，“事情的有无”才始终是它的关注焦点。只不过因为“有无”本身比较坚硬，难有回旋余地，不适合作为争辩的范畴，所以它才避免了“正面强攻”，而选择一种迂曲的争辩方式，扣住各“版本”所叙述的事情经过即“怎样”做文章，试图从细节上打开缺口，模糊“有无”的坚硬边界，从而达到预期目的。

它达到目的没有呢？“四个版本”中的前两个，明显属于“演义”性质，要从细节上抓破绽很容易，它抓了；要证破绽，可以自己出来举证，也可以拿别的“版本”参证，文中这两个办法也都用到了。这里且看它如何以第三个“版本”（李辉）来证第二个“版本”（化铁）之谬。

化铁即刘德馨先生是“七月派”老诗人，他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一个传神的细节：

饭后，舒芜去了客房拜会贾植芳。贾植芳露出一脸茫然的样子，对着伸出的手，用标准的山西话说：“您是谁？我不认识你。”事后有人问贾植芳：饭都吃了，怎说不认识？贾植芳说：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③

这个描述促使舒芜先生当即致信刊文媒体，写下了他对此事的第一篇公

①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下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② 《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读书》1997年第3期。

③ 转引自舒芜：《贾拒认舒版本考》，《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

开回应,指化铁先生的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并顺便指出第一个“版本”(没有直接点名被拒者为舒芜)“更是与事实出入太大”。随后,李辉作为贾先生与此事有关的两次北京之行的陪同者,以“历史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对“贾拒认舒”的事情经过详加说明,指出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化铁的叙述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了”^①。对此,《版本考》表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它一方面对“并非空穴来风”不置一词,一方面对“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感到兴奋,并由此做出了全局性的结论:“‘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这个与我的实物证据大相矛盾的传奇式情节,既然弄清了是没有的,或者说弄清了是将两个‘素材’合成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

“传奇式情节”的“没有”当然并不能抹煞其所依托的“素材”的真实性。真正使“问题已经差不多了”的,只能是事实本身的呈露。《版本考》没有对“李辉版本”的叙述本身提出质疑,是否正说明了它无可置疑?

但舒芜先生却能从不疑处有疑。“四个版本”中的最后一个,是贾先生自己的现身说法,也即是舒芜先生期待了很久的“祖本”。既然是“祖本”,关于事情的有无和怎样,按说应可止争,可是舒芜先生却说“看不懂”。他所“看不懂”的,不是贾先生文中对事情本身的陈述,而是对所以要提起这件事情的缘由的陈述。也即是说,是一个与“事情的有无和怎样”不相干的错误。舒芜先生抓住这个错误,发出了一系列疑问。他把这些疑问提给编辑,引来报纸刊登“更正”启事,表示“向相关人士致歉”。但报纸的更正却不仅没能打消他原有的疑问,反而引出了更多疑问。最终,舒芜先生写下《版本考》,在文章结尾将事情引向了他自己与贾先生的年龄的比较论,论断曰:

期待已久的“祖本”出来,竟然如此。考来考去,仍然考不出头绪。贾植芳先生九十高龄,我今天也开始了八十三岁。同是以耄耋之年,回忆二十多年前的事。他记忆之有,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我又怎敢单凭我记忆之无,否定他记忆之有?何况“说有容易说无难”,是考据的常识哩。

那么,也只好如此,对不起读者了。

^① 李辉:《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文汇报》2004年8月13日。

舒芜先生的疑问和论断间接坐实了贾先生为报载文章中错误的责任人，并把所有想要接受贾先生关于往事的说法的读者，逼上了必须对九十岁的先生的记忆和精神状态的正常性作出说明的境地，这是他的成功。呜呼，成功。

二

报上刊出的贾先生《九十岁的生活》一文中出错的一句话是：“李辉此文，是针对舒芜 2003 年 8 月以化铁笔名在《闲话贾植芳》一文中写我与他的交往史实的补正。”这个表述把“化铁”当成了舒芜的笔名，错得是比较离谱。何以至此，也是令我在舒芜先生的文章作法之外心生惊讶的另一个缘由。因为说起来，此文的发表多少和我有点关系。当初编辑部来邀稿，希望选发一点先生的近期日记，初步的选材工作先生是交给我来做的。我通读了截至选稿日期的先生的当年日记，划出从某日到某日的可供选材的范围，交还给先生，就算完成了任务。此后这个稿件还经历了哪些处理流程我不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通读日记原稿时没有发现有这么离谱的错误，否则它是不大可能从我手底下溜过去的；而最终经手做文字处理的，似乎也不大可能是先生身边的人。以化铁先生在“七月派”和“胡风集团”中的知名度，先生身边的人会把与舒芜先生混淆起来的可能性，应该比较低。但话说到这一步，我也不能完全有把握说一定是报社编辑所为。因为在先生向报社交稿之前，恰好有某位热心而又粗心、或者不很熟悉情况的朋友帮了倒忙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所以很抱歉，尽管我有志于为舒芜先生释惑，但对究竟是谁导致了贾先生文章中的离奇错误，我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可以提供，而只能在这里为报社的“更正”做一个佐证，即证明贾先生《九十岁的生活》中，“关于‘化铁’一句，原文应为‘李辉写此文是针对舒芜 2003 年 8 月对化铁的《闲话贾植芳》一文中写我与他的交往史实的补正’”。

为此，在征得先生同意后，我从他的日记原稿中抄出了相关段落，以供有兴趣的读者比对。同时这也是珍贵的原始文献，拿来作为本文为“贾拒认舒”故事补足的第一则材料，可谓再理想不过：

本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刊出李辉写的 1983 年我们夫妇进京开

会时,由他相陪访问舒芜,1952年舒芜写文“反戈一击”卖友求荣,被由广西调到北京后红极一时,但反右时又被划为右派的复杂生活情况以及我们访问他家的具体情况。李辉写此文,是针对舒芜2003年8月对化铁的《闲话贾植芳》一文中写我与他的交往史实的补正。李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对舒芜此信的补正与评论,是一篇有史有证的随笔。作为当事人,我应该在这里再补充一些更形象更具体的材料。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代会时,住京西宾馆,舒芜也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访问我,被我拒绝情况,事实是,在会议期间,某一天上午,我听到叩门声,开门后,原来是舒芜来访。我以对陌生人的冷淡态度问他:“你找谁?”他则是满面笑容地像熟人的表情对我说:“就找你。”我听后以不屑一顾的冷淡态度回答说:“我并不认识你。”后即随手重重地把门关闭。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发现他对自己50年代犯的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毫无悔罪表现,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无耻之徒。因此,与他断然绝交,划清界线。

贾先生是新文学作家出身,养成了欧化语体的写作习惯,到老仍喜欢写结构复杂的长句,也喜欢把事情的细节描述得很详尽。这种风格的写作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可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角角落落说得很周全,省得“留白”太多让人遐想联翩;但也有它的不利,即对写作控制力的要求很高,稍有不慎便容易出错。毋庸讳言,在这段文字中,贾先生的原始表述也并非尽善尽美,而体现出写作习惯与控制力之间的较量。段落中的第一和第二两个句子都长而复杂,容易把人绕晕。尤其第一句,似乎应该在“1952年”之前加上“了解到的”才更容易理解。第二句即上举惹事的句子,它试图把三位作者的三篇文章各自的针对性放进一个句子里说清楚,的确有点勉为其难。但这个句子除了有点头轻脚重之外,语法上并没有错误。句子的主干成分是“李辉是针对补正”,“补正”作为宾语从句“针对……补正”中的宾语,所携带的定语有点多,但也并没有繁难到令人看不懂的地步,不幸却硬是被人当成病句改出错来。推敲改出来的错句,它的主干成分变成了“文是补正”,“针对”仍然引领一个从句,只不过变成了定语从句,它的宾语也变成了“交往史实”,而这个“交往史实”又由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总之,其错也不在语法,关键还是在想当然地误认了“化铁”的真实身份。

因为一个常识性错误惹出这么多口舌,这也算是一个教训,可用于警戒那些热衷于修改别人稿件的人,不要过于自以为是地率尔操觚。

三

《版本考》花了很多笔墨在“版本”和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兜兜转转,却始终回避了一个问题,即,“李辉版本”和贾先生自己的文章都明确指出“贾拒认舒”发生在第四次作代会期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们看不到舒芜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正面涉及,只听到他含糊地说:“他记忆之有,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这个说法很巧妙地回避了“有无”的坚硬性,使有或没有的问题变成了信与不信的问题。因为有或没有各执一词,不可争论,而凭什么信、凭什么不信才是需要理由的。贾先生的“记忆之有”为什么不足以否定舒芜先生的“记忆之无”?因为舒芜先生在自己的“记忆”的支撑下,建立起了他自己对事情的完整理解,有着一整套识、情、理在帮助他构建和巩固理解框架,轻易难以撼动。因此,要想说服他相信贾先生的“记忆之有”不是老年昏聩之下的“妄想型回忆”,就必须帮助他建立起另外的理解,即对事情“何以会有”的理解。

先看舒芜先生所理解的“何以会无”。他把这个理解表述得很清楚,即:“那次贾植芳既然专诚来访,自不会有我伸手握而他握不握之事。后来吃饭、同游,也不会有此情况。所以我认为贵报文章所说,恐怕有什么误记、误传。希望将我此信刊出,以帮助回忆。”^①

从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看,这个理解简直无懈可击。一个专诚登门拜访、而且曾与受访者吃饭、同游的人,怎么可能“拒认”受访者呢?由此所谓“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也就显得尤其古怪而不合情理了。上文说到,当李辉指出“化铁的叙述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了”之后,舒芜先生立即欣然下结论,由“传奇式情节”的“没有”推衍到整个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他所以会表现得如此急迫峻切,正因为在他的理解中,这些各有出入的说法根本就是不可理解、难以置信的。

但是,正如舒芜先生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的那样,事情往往既有这一面,

^① 舒芜 2003 年 8 月 4 日致《书友》编者,转引自《贾拒认舒版本考》。

也有那一面。在他这一面既已如此,在贾先生那一面,事情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并不陌生,以前就曾听先生说起过。这次为慎重起见,我又请先生完整地讲述了一遍。讲什么呢?讲他与舒芜先生的交往始末。正如化铁先生的“创作”所强化的那样,“贾拒认舒”是一个带有一定传奇性的事件,人们热衷于传播它,原因也正在于此。当人们把它当作一个传奇来讲述的时候,所侧重的可能是它所体现的品格、性格和人格,这当然没什么错,但却可能使它失去了历史的具体性,使它在特定历史线索下作为特定历史过程的结果的可理解性变得飘忽不定。“贾拒认舒”当然不是什么不合逻辑的心血来潮或无中生有的产物,而是由贾、舒全部交往历史所铸成,只有还原到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去,才可望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充分的理解。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根据先生的讲述和相关资料,故事的起点应在1947年初。据《舒芜口述自传》^①,1946年初冬舒芜到设在徐州的江苏学院任教,随后“利用第一个寒假时间”,往南京、上海走了一圈。那时贾先生在上海刚刚结束《时事新报·青光》周刊的编辑工作,和妻子任敏一起移居吴淞路义丰里,开始他们1949年前在上海仅有的一段短暂的安居生活^②。贾先生说,有一天胡风带着一位年轻人来他的住处借宿,这位年轻人就是舒芜,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由此订交,贾先生和师母都很高兴地接纳了这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也没有令他们失望,随后一段时间相处愉快。他们从他那里得知了很多胡风在重庆的事情,以及他从胡风那里听来的重庆文化界的事情。而更加令他们、尤其是令任敏师母感动的是,半年之后,当他们夫妇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狱,师母经保释先行出狱后,既要自己挣扎图存,又要设法营救先生,处境十分艰难,这时,再次来到上海(这次是为赴广西任教^③)的舒芜慷慨解囊,给予了他们金钱上的资助。

关于此事,孙乃修著《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④有如下记载:

任敏出狱后无处栖身,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接济。这些热心的朋

① 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参见宋炳辉编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传》,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③ 《舒芜口述自传》,180页。

④ 孙乃修:《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162—163页,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